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平

#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 上海写作



王光东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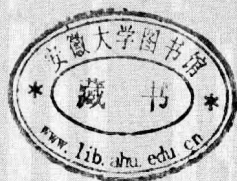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平

#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 上海写作



王光东 杨位俭 黄景春 王文军 著  
周展安 黄蓓 王聪



上海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上海写作/王光东等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3. 4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忻平主编)  
ISBN 978-7-5671-0186-9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9810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封面设计: 张天志

版式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上海写作

王光东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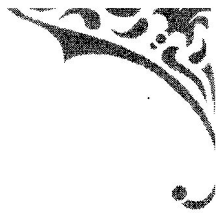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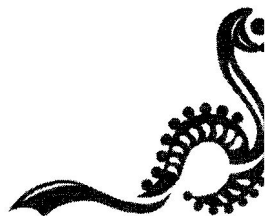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33 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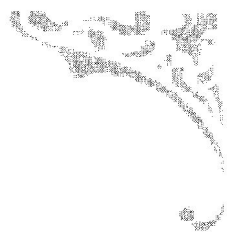
ISBN 978-7-5671-0186-9/I·168 定价: 6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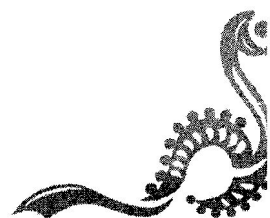
**本研究受上海大学“211 工程”  
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  
(A.15 - A011 - 09 - 001) 资助，谨致感谢！**







本书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三期）  
“中国现当代文学”（S30101）的资助，  
谨致感谢！



# 总序

忻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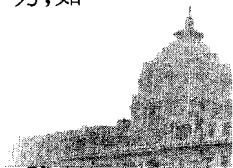
## 一

这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是上海大学“211 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课题的部分成果。

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生态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及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共同关心的领域,它吸引了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研究多集中在精英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讨论上,近年来对民间文化生态研究也已开始多起来。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及全球化的深入,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现代、中国/西方、国家/社会、主流/边缘等多种文化资源与价值取向交融竞争,使民间文化生态更趋复杂,也引发以“信仰/价值的缺失与重构”为核心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要求研究视野更多地从上层转向下层,从官方转向民间。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变化趋势之一。民间社会的文化资源需要重新整理与总结,其社会转型中引发出的问题,也必须在充分研究的前提下谋求解决之道。

以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开始了漫长的社会转型。不仅史学界以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研究对象,人文社科各学科也以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为重大问题。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已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有更确切的含义,包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威权政治向民主社会等社会经济全面的转型。

由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当代社会转型,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产力,如



今中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不应回避的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学者作出了“社会溃败”的悲观判断。中国发展的模式无疑是成功的,发展走向也是合理的。然腐败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也已充分暴露。可以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时期。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努力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文化自身的状况及其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实际事关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它诞生初期主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其后开始关注文化内部间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关联,并认为这种关联性影响和制约着文化整体的发展。因此文化生态被视为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化生态不容乐观,日益加剧的全球化不断地吞噬着地方的传统文化,威胁到文化的多样性。无孔不入的商业化和世俗化导致文化受到污染。通俗文化的强势和精英文化的缺失使得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功利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匮乏,只重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从而造成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价值扭曲、信仰失落等一系列负面后果。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必须修复文化生态的平衡。这既要靠法律制度层面的规范,又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实现全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的文化自觉,从而达到文化生态的和谐。

人文基础学科有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本项目从城乡社会生活、文化生产、信仰与价值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研究“转型

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通过科学地认识转型期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间文化生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知识基础、话语体系和决策参考。

城乡生活是民间文化生态的基础,也是海内外学术界关心的前沿问题。本领域的研究结合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发展演变。但已有的相关成果多集中在古代及大城市研究上,对近代转型期的城乡社会生活的比较及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化生态的互动关注明显不够。这与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城乡社会生活变迁引发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态急剧变革的现实是不对称的。有鉴于此,我们将“近现代城乡生活与文化生态”列为本项目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以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如何改造与重建城乡文化生态为出发点,研究城乡生活与中西文化、乡土文化与民间精神、方言与地域文化,通过研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代谢,揭示其中传统与现代因素、本土与外来因素的衔接、冲突与竞争,试图找出影响构建适应经济基础的文化生态中的核心问题与应对之策。

对中国民间文化生态得以生成、运行与传播的文化生产机制的分析,是民间社会文化生态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对文化生产问题的关注首先来自马克思。国外学者韦伯、阿多诺、鲍德里亚等纷纷从现代性、文化工业、消费社会等多种维度展开了对文化及其文化生产机制的考察。国内有关文化生产机制的提法最早由王晓明教授提出,将生产机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文化领域,探讨中国当代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及其历史条件和资源,将有力地推动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因此我们将“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及国家策略”列为本项目的另一个方向。该方向关注当代日常生活文化、文化传播机制、文化观念/意识、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分析和现代早期的思想与文化等内容,研究正在形成的文化状况及其生产机制以及是否能有效地参与新的文化现实的构建。

信仰多样性及其认同是民间社会文化生态合理构建的核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的渗透与竞争产生了民间的信仰多样性的局面,使得信仰及其认同的探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日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分析民间文化生态中信仰多样性的现状及原因,将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导下,寻

求和建设民间社会共同价值认同和国家对信仰问题的有效治理与引导。因此我们将“信仰多样性的民间认同与政府管理”作为本项目的第三个方向。该方向从宗教信仰与民间社会认同、当代宗教与社会转型、知识及价值与主流信仰等问题研究入手,探讨转型期社会信仰多样性及民间社会基本价值认同的状况及变化,为和谐社会下民间信仰体系建设提供知识和决策参考。

## 二

自近代以来,上海在中国一直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海内外学者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学界对它的重视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上海学”的概念,用以强化上海研究的学术和学科意义。上海大学作为上海地方高校,早在80年代便向本科生开设了“上海学”课程。本项目课题团队依托上海大学的这一传统优势,将上海作为一个研究重点,经过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协同努力,得以出版这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概言之,本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其时间脉络的完整性。本丛书的关注点从上海文明的古老源头一路延伸到当代。张童心近年对上海及其周边的考古研究,揭示了上海文化起源与早期文化生态。他参与主持的广富林遗址最新考古发掘,将上海地区的人类文明史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崔志伟的《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对元明之际松江文人群体的来源、交游、政权更替下的文人心态、文人创作题材与形式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刘蕾从归有光与嘉定文坛关系入手,展示了归有光在嘉定文坛地位的确立及思想的传承过程,探究了明清之际归有光文坛地位发生转变的原因。忻平的《危机与应对:1929—1933年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研究》一书把视线拉到近代。通过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下上海市民各阶层群体和组织、不同领域和生活方式的多维考察,展现了危机时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多元特征及民间应对方式。王光东等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上海写作》一书,以张资平、茅盾、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作品为个案,讨论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上海的想象方式以及产生的原因,阐明了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及其内在关系。王晓明的《今日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九十年代以来主流文化的生产机制》则进一步将目光

定格在当下的主流文化的生产机制,考察它与都市青年日常生活的关联。

第二是关注民间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活的日常性。陶飞亚的《中西文化交流与上海世俗生活》便从历史的移动中展现基督教宗教东来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这样一个见微知著的历史命题。王晓明对当前文化生产机制的考察,也是从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角度切入。忻平主编的《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更是展现了上海社会日常生活的诸多面相。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性。多学科意味着多种学术探讨的方法,本套丛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仅涵盖了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学科视角,更对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了广泛借鉴。如蔡翔和董丽敏等著的《空间、媒介和上海叙事》一书,就是运用了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从空间和媒介两个视角,考察上海文学叙事过程文化观念形成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和文化关系的重构,分析由此形成的上海符号和符号体系。

第四是研究方法的直接针对性。本丛书以上海为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对上海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新的探索。曾军等著的《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集中反映了这一关怀和努力。此书意在以上海为方法,去充分展示“中国模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深刻揭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同时通过反思性、批判性的维度,来探索一种上海作为综合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本书构思宏大,内容丰富,囊括了上海与中国城市形象定位、上海与中国城市精神建构、上海与中国城市建筑美学、上海与中国城市改造运动、上海与中国城市文化记忆、上海与中国文化制度变迁以及上海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等重要问题。

第五是学术关怀的当代性,即注重当代上海的最新变化及发展趋势。吕建昌的《上海世博会与未来上海发展》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从文博事业的角度审视历史上世博会与博物馆发展的关系,进而扩展到世博会对城市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影响,博物馆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世博后上海城市未来的发展走向等问题。本书提出了上海世博会后续“文化效应”的概念,为全面、客观评估世博会对举办地所产生的总体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雷洪波的《移民视角下的上海城市语言接触》是对当前上海正在发生的语言接触所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研究,旨在通过描述当前城市背景下移民的语言选择模式、语言习得、语言能力、语言态度等相关问题,从语言接触中的另一方——移民的角度出发,反映语

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现实。王天恩的《历史逻辑与主流信仰——以上海市情为背景》从哲学的层面对当前上海的主流信仰进行了剖析,无疑也体现了本团队强烈的现实关怀。

丛书的作者,既有资深学者,又有青年新锐。丛书得以付梓出版,是多年来团队集体努力的结果。作为丛书的主编,我衷心感谢大家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很高兴承担这个编辑工作,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推介给广大读者。由于时间仓促,丛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不足,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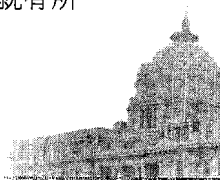


# 导言：“都市”与文学——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都市小说”说起

“都市”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国家文明的发展程度,因此,“都市”也就必然地成为文学的写作资源,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都市”和文学一直就是文学写作的重要问题,梳理五四以来的都市文学发展过程,不仅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精神的变化,而且也为今天都市文学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界曾提出“新都市小说”的概念,对于当代都市文学的理解可能正是我们回到现代文学中“都市”的文学动力,为了说明我们为什么研究“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上海书写”这一课题的原因,就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新都市小说”说起。

“都市”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只能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都市小说”的“新”。我们说的“新”是无法与世界性的大都市纽约、东京、巴黎相比的,我们只能从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待这个“新”,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把今天的中国都市与昨天的中国都市相比较来看待这一问题。就世界范围内来看,我们的“都市”显然正在形成过程中,它所具有的世界性都市特点是不明晰的,它自身的内容是复杂、混乱而又多层面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过程,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过渡犹如一个巨大的漩涡无情地揉搓着中国的都市人。有人说中国的都市是扩展的“乡村”,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较为确切地说明了中国都市的特点。由此,我们的“新”就只能是特定意义范围内的、中国化的“新”。

中国化的“新都市小说”的“新”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中国当代都市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上海、北京和内地的其他城市就有很大的区别。处于不同城市中,人的文化心态和生态也就有所不同,所谓“新”的程度也就难以把握。再加上不同都市在其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不同历史文化条件的影响,其人文形态也就有所



区别,作为描写“都市”的小说也就有不同的色彩,譬如北京的宽容、上海的精明、济南的敦厚等。诸类各方面的原因,要给“新都市小说”的内涵及其艺术风格特征作一些明晰的界定是十分困难,也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说“新都市小说”的主旨不明确,从《当代小说》所发表的作品以及我们的理论设想出发,“新都市小说”还是有其鲜明特征的。下面我们就对“新都市小说”所呈现出的特点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同时也牵涉到对于“新都市小说”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思考。

“新都市小说”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值得倡导的创作实践活动,并非仅仅是对于“题材领域”的一种规定,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创作主体的一种精神状态,表现为描述对象所呈现出的生存方式与心态,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新”的内涵所在。

《当代小说》在“新都市小说系列展”中推出的十几篇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都市人的心态透视,思考人的生存意义及精神问题的小说,主要有陶纯的《B市的不眠之夜》、于艾香的《爱情是一场疾病》、老加的《隐秘艳遇》、大雪的《夜色斑斓》、高胜历的《灵魂故事》等。这些作品的主观色彩较为浓郁,有哲学意味和心理分析的长处;另一类是侧重描写都市人或“准都市人”的生存形态及在都市文化的嬗变过程中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精神风貌的变化,呈现出都市人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这类作品主要有李心田的《银后》、姜凡振的《女儿墙》、赵德发的《那天凌晨有流星雨》、裘山山的《本命年》、凌耀忠的《再渡鹊桥》、闫欣宁的《毁灭的庄园》、许辉的《走》、梁晴的《草酸》、戎辙的《蚯蚓》、王金年的《百万明星》、胡竞舟的《七月流火》等。这些作品都有着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有着审视“都市”的各不相同的视角,它们都通过自己的艺术方式写出了有“新意”的内容。

都市是充满了诱惑、喧闹、动荡的一个空间,在闪烁着霓虹灯的夜晚和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陌生的面孔透露着喜悦、烦恼、疲惫、冷漠。目睹这一切我总想到一句歌词:“多少面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难道在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精神在被无情地“放逐”了吗?“精神的放逐”在都市的世界里是暂时的一种人文现象还是带有某种长久的时间性呢?我想这种“精神放逐”的痛苦并不是暂时的现象,“都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总是要给人的精神带来某些戕害,那种冷冰冰的交易法则则是无法与人的心灵情感相通的,因此我们读到了卡夫卡那震撼人心的《变形记》,

还有萨特对于人的偶然性存在的深刻阐释……于是在城市人的情绪中，我们读到了透入骨髓的漂泊感和孤独感，读到了作家对于人的终极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和人文精神的关怀。在“新都市小说系列展”中陶纯的《B市不眠之夜》、于艾香的《爱情是一场疾病》、老加的《隐秘艳遇》就有这类作品的特点。《B市的不眠之夜》是一篇我特别喜欢的作品，当苏特拒绝了毕业分配，独自撞入社会以后，寻找精神归宿的渴望就一直伴随着他，然而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把他带入痛苦的深渊，就是爱情也带有欺骗的成分。现实与精神之间的巨大反差，把他的希望击得粉碎，表现出现代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人的生存意义到底是什么？在笼罩着一片昏暗与龌龊的氛围中，透露出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深刻关怀。都市的路灯没能挽留住苏特的生命，而苏特的生命却留给了都市人一个巨大的问号，一个永恒思考的问题：人的灵魂归宿到底在哪里？于艾香的《爱情是一场疾病》以她那细腻的感觉，敏感地把生活中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刺激转化为人的心理活动，在人物心理的多层次变化中写出了“爱情放逐”的悲哀。逃避爱情——这是当代都市人灵魂被异化的人生困境，这篇作品与《B市的不眠之夜》有着一个相同的主题：人的情感与灵魂的归宿问题，但《爱情是一场疾病》比《B市的不眠之夜》更情绪化一些。作品中“她”那空洞洞的眼神追寻着苏格拉底或梵高，而实质上追寻的却是感情的归宿，透露着对现实不能认同的深刻孤独和对漂泊之苦的恐惧。老加的《隐秘艳遇》对于人的潜意识及其行为方式有着较为深刻的分析和描述，这篇作品也在关注着人的“自我”在社会中的意义，思考着“自我”与社会的不和谐所带来的孤独和苦闷，一缕有点轻飘却又是无处不在的苦涩使人尝到了人生之旅的苦味。大雪的《夜色斑斓》写得轻松、不俗，把一个少女的心态写得细致入微，传达出了都市人情感生活的内在矛盾。夏澜青春期的迷茫与色彩斑斓的都市生活带给我们一个充满生动气息的世界。高胜历的《灵魂故事》则在许永宁的婚变与情爱的变化中，写出了城市人“情爱之梦”的破灭，细致的心理分析中，浸透着作者的生活体味和无奈的悲凉。

如果说如上几篇作品都在对人生历程的体验中，感受到了都市文明带来的心灵痛苦，在文明与“失落”的冲突中，揭示了生命的渴求与期盼，那么李心田的《银后》、姜凡振的《女儿墙》、凌耀忠的《再渡鹊桥》、许辉的《走》、裘山山的《本命年》、赵德发的《那天凌晨有流星雨》、戎轍的《蚯蚓》、胡竞舟的《七月流火》、王金年的《百万明星》等作品，却在更具体的现实层面上，描写了当代都市人所面临的新问题。李

心田的《银后》是一篇有分量的力作,“银后”在演艺圈、商界的所作所为,鲜明地体现着社会转型期的印痕,她的追求与失落、风流与心计、自信与脆弱、清高与势利、卑俗与高贵……显示了都市人复杂、精明的性格和心态。姜凡振的《女儿墙》也有着与“银后”相同的意旨。许辉的《走》在艺术上是很有特点的一篇作品,错落有致的结构和多变的生活场景相交织,揭示了生活丰富而复杂的景观。《再渡鹊桥》和《本命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当代都市人在各自不同的生活位置上所产生的心灵的无奈与精神的疲惫,宿命的悲凉与时代的变化带给了我们复杂的感受。赵德发的《那天凌晨有流星雨》,写出了“都市人”在情欲、物欲挤压下精神的苍白,表现了作者对人的生存意义及生存环境的强烈忧患意识。戎轍的《蚯蚓》写得虽有点拖沓,但对于生活的描写还是很有深度和韵味的,特别是作者置身其中的生命感受——对于自己所作所为难以把握的无奈与悲哀是深刻的。

闫欣宁的《毁灭的庄园》是一篇有新意的作品,他写的虽然不是“真正的都市人”,却揭示了在“现代都市”的形成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似乎并非纯是“都市”的环境问题,而是“都市与人”之间追求与排斥、融化与抗争的一个生存问题,也是一个“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如何转化与发展的问題,其间带给我们思考的空间是相当宽阔的。

通过如上作品的简单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都市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出现的那些都市小说是有着不同的质的,这种不同的新质主要就在于它的生活的当代性特色,对于城市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审视,都立足于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并且由对具体生活的描述,进入了对于“都市文化”中一些带普遍性问题的思考,既有历史发展的眼光,又有对人类性问题的思考,也有对现实生命精神的把握。从艺术水平来看,作品质量不平衡,有些作品达到了较高的层次,有些作品却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有的立意很好,但表现功力不够,有的叙述语言很好,内容却有点轻飘。但从总体来看,这些作品还是为当代“新都市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参阅的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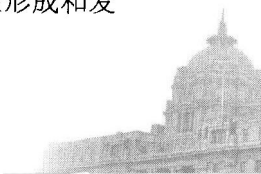
我们在前面曾说过,“新都市小说”是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领域,但从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看待目前的“新都市小说”创作,显然还缺少有深度的力作。我们不妨在纵横两方面来作一些比较。从纵的文学史发展过程来看,在中国 20 世纪的

文学中,30年代的都市小说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譬如以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小说”,茅盾的《子夜》,等等,这些作品对于都市生活及都市人心态的描写及揭示是深刻而有力度的。这些作家不仅在语言、结构方式上力图与城市的生活节奏相谐调,而且有一种“都市精神”洋溢于作品的字里行间。“都市精神”是一个非常宽泛和不易说清楚的提法,似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们把茅盾的《子夜》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作一点比较,就能清楚地感觉到两者之间精神的差异。如果把《当代小说》发表的这些“新都市小说”与30年代的“新感觉小说”相比较,我们也同时感到“都市精神”的不足,具体一点说对于都市人心态的表现缺少深刻的典型性,都市文明的长处与对人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表现得不够深刻、缺少高度。如果和世界范围内的都市小说相比较,我们则感觉到我们的“新都市小说”缺少对人的生命的深刻把握,缺少哲理的深度,我们过于注重生活场景的叙述,而短于哲学的思考;我们长于对生命感受的表现,而短于对“生命精神”的把握。“生命感受”与“生命精神”是相联系但并不能等同的概念,生命感受是情绪化的,而生命精神则是情感与理性的结晶。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都市小说作家似乎缺少与都市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譬如“都市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都市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都市一方面为人提供了优裕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又在消解和吞噬着人的精神空间;人们一方面在不择手段地进入都市,另一方面又在诅咒着都市……这相互联系又相互冲撞的悖论性难题,应该说给都市小说造就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在这种冲撞中,人的心灵是有着写不尽的故事和奥秘的。另外,城市文明一方面创造着新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又在无情地遗弃了农业文明中一些美好的情愫;一方面在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又在想方设法地、甚至是矫情地人造一些假山假水……诸多问题都应该是我们的都市小说家所应该关注的。

随着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人的内省意识应该愈加强烈,人在关注外在世界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人自身,关注人与外在环境冲撞中价值的失落、意义的丧失,关注人的精神的归宿、人的创造性及终极存在目的。这一点在目前的都市小说创作中显然也是较为薄弱的。

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完全由小说自身负责,因为我们的都市目前还在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都市精神”在作家的心灵里也正在孕育生成。在目前对“新都市小说”过多地挑剔和责备是不合适的,但是从一种理论的愿望出发,提出一点设想,也许是有一定意义的。我觉得新都市小说应该具备如下几点特质:① 都市是开放的、发展的,我们的小说也应开放的、发展的,凡是与都市相关的种种领域、都市中的各种人生都应是表现的对象;② 作家对于生活与人生的感悟和思考应该具有都市的意义,如果这种感悟与思考缺少特有的都市特点也就失去了“都市小说”的价值;③ 都市小说应该具有都市的文化形态和对都市文化形态中“人的个体生命”的强烈关注,既关注都市现有生活形态的变迁,又关注人类生命的终极意义;④ 都市小说应该有自由、灵活、开放的艺术形式,叙述视角、语言、结构等应更趋多样化。

理论的设想往往是虚妄的,而都市生活却是日日常新,充满活力的,特别是今天的“都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城乡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语境中,如何理解今天的“都市与文学”的关系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文学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文化问题、社会问题,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上海写作”所包含的各种思想也许能为我们今天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思考参照。

